

《中国印刷史》自序

张秀民

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被西人称为我国的三大发明。英国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在十七世纪曾说：“这三种发明，将全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都改变了。又从而产生无数的变化。印刷术在文学，火药在战争，指南针在航海，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宗教或显赫人物，能比这三大发明对人类的事物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现在很清楚的知道，发明是来自中国的”。若加入造纸术，则成为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人类社会作出伟大贡献，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

印刷术称为“神圣的艺术”，又号称“文明之母”其重要性尽人皆知。“知识就是力量”，而力量的源泉之一，主要来自书本。莎士比亚称“书是全人类的营养品”。而这营养品是作家写出的精神产品，又是用纸墨印刷的物质产品。孙中山先生非常重视印刷业，把它与衣、食、住、行四种生活必需的物质条件，看作同等重要。印刷品如钞票、图书、报刊、各种票证，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之物。印刷业由教育文化领域，扩大至工商业，成为各国的重要工业。

七世纪唐初贞观年间，我国发明雕版印刷。比欧洲早七百年。十一世纪北宋庆历年间，毕升发明活字板，比德国谷登堡约早四百年。而欧洲采用活字印刷后，即带来文艺复兴，科学文化突飞猛进，而我们反而落后了。这主要由于明清两朝实行八股文取仕，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消耗在无用的八股文上。又由于清康、雍、乾三朝发生一百二十多次文字狱。学者为全身远害，不得不钻到古书堆中，研究文字音训。与清初顾亭林所提倡的经世致用背道而驰。社会上又视创造

发明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得不到赞助发扬。印刷术亦少进步，于三百年来，始终以雕板为主，大概可以说清刻本不及元明刻本，元明板又不及宋槧之字体美观，雕镂精工，纸墨优良，裱背大方。活字本数量不多，在印刷中居次要地位，以木字为首，铜字次之，又多出于私人之手，只有康熙内府刻铜字，乾隆造木活字一次，与李氏朝鲜铸造铜、铅、铁字至二三十次，木活字二十多次，大不相同。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前后，西方的石印、铅印输入，我国传统的雕版与木活字印刷，遂被淘汰。

解放后，我国的印刷业有很大发展，职工近百万，印书六十亿册，工业总产值约五十亿元。成为重要的轻工业。但比之发达国家，差距甚大，主要是技术落后，出书周期太长。一本几百页的书，人家一两星期就可出版，而我们却要半年甚至两三年。虽早已引进照相排字机，但未推广，一般仍用手工排字，又乐于用旧式低速平台机，装订不够机械化，所谓精装并不精。这对于我们最先发明印刷术的国家是很不相称的。如何改正缺点，迎头赶上，尚有待于有关方面下决心去解决。

我国最早发明印刷术，照理应有不少著作来记载传颂。但过去就缺乏这方面的专书。近代孙氏《中国雕版源流考》过于简略，叶氏《书林清话》只是板本资料汇编。待美国卡特教授《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出，始有系统的专书。法国伯希和《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一书，繁征旁引，博而寡要，反不及卡特书之有内容。且印刷术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之重大发明，而印刷史之作乃由

外人代庖，心实耻之，乃不自量，蚊力负山，立志要写出一部《中国印刷史》。

初，余在厦门大学（当时由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肄业时，受瑞安李笠（雁靖）先生的启发，对图书目录学发生兴趣，只要不上课，就进图书馆（集美楼）书库，自由阅览图书。发表过两篇有关版本目录的文章，由李师寄交给当时北平图书馆徐水袁同礼（守和）付馆长。袁先生看了后，即用馆方名义来信，谓“新馆落成（今文津街北京图书馆）需人，望速来”。于是未及行毕业礼，就到馆，时为1931年7月初。

北京图书馆是历史悠久、闻名世界的国家图书馆，其中少数印本盖有南宋皇宫“缉熙殿”、元代“翰林国史院官书”大朱文印，其他宋、金、元槧本，唐人写经，明清精抄本，均稀世之珍。不过解放前藏书总量仅有一百四十五万册。前几年已超过一千万册，书满为患，故早有建新馆之必要。余有机会能在这个环境优美的琅环福地连续工作四十年，可算是幸运的。

袁馆长不光是发挥一个公共图书馆的职能，同时把它办成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聘请了知名学者向达（觉明）、王重民（友三）、孙楷第（子书）、贺昌群（藏云）、赵万里（斐云）、谢国桢（刚主）、刘节（子植）、王庸（以中）、梁启雄（述任，梁启超幼弟）、谭其骧（季龙）先生等十余人，从事史地、版本、金石、文学、哲学、满、蒙、藏文等研究。在这种浓厚的学术空气中，我自然受到薰陶切磋之益，也坚定了写印刷史的决心。

余进馆后，在中文编目组编制古书卡片目录，每一书必细阅书中内容、序跋、弄清楚作者真名实姓、字号籍贯、生卒简历、刻板地点、年代、书籍性质，以便给分类号、著者号。后又编书本目录的史乘类及集部、先后十多年。为了写印刷史，故注意收集有关版本印刷的资料，当时多记在草片上，先后写成大小笔记本约七十册，其中有《宋板

书经眼录》、《宋刻工名录》各二册。为了找资料，看完馆藏全部宋版之，残存《永乐大典》二百余册。数十年内翻阅了大书库数千种地方志、诗文集、笔记杂说及日文、西文版本目录书，只不过是书库中数十排钢架而已。

1937年芦沟桥战事起，感到国家危亡，平昔所从事的版本目录，只是书皮之学，对国家兴亡，并无实际用处。于是决心抛弃，改弦易辙，开始研究安南史。先后完成《安南内属时期名宦传》及《职官表》二书。前者张星烺（亮尘）先生序，以为“可作一剂爱国药”。

1952年10月馆中开中国印本书籍展览会，当时我写了一篇《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对五洲各国的影响》刊登《光明日报》，后被《文物参考资料》转载，廖承善冲李印老（李希泌先生之父）之嘉许，以为可以传世。于是把弃置多年的板本目录，又重新捡起来，加以扩充，成为《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195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78年再版。1980年有台湾版。日本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神田喜一郎博士见之，以为这是“一本非常诚恳真挚的好书”，嘱广山秀则先生译成日文，于1960年（昭和35年）在日本京都出版。一时日本、苏联、美国刊物上有书评介绍或报导。1977年日本蕞内清教授译注卡特书中，于拙作及拙文多加引用。李书华先生1962年于香港出版《中国印刷术起源》一书，大部分引用卡特及拙作资料，均分别注明。81年6月王益先生在《印刷战线》上对卡特书有好评。并说拙作“提出了不少独创的见解，发掘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成为研究中国印刷术发明史的最权威的一部著作”。82年4月20日神田博士来信说：“先生多年精研贵国印刷史，深造自得，中外所仰”，过蒙夸饰，徒增愧汗。有的大学图书馆学系或以此为课本。

旧作印刷术的发明和影响，只是《中国

印史》的首尾两部分。其中主体唐五代以后至清末，先后只发表过零星文章三十余篇。活字版部分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活字印刷史话》（中国历史小丛书之一），1979年版三次印刷，仅一万余字，过于简略。后扩充至五万字，成一专书，请人誊成清稿（尚未出版）并计划将全部印刷史早日杀青。

会文化大革命起，数十年来节衣缩食所积蓄的图书刊物，装满两辆三轮车，不得已托人论斤出售，作造纸原料，而印刷史、越南史的资料亦有损失，自然不敢再提笔写作了。后被下放至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生活劳动在荒凉潮湿的湖旁小丘上，约一年余。1971年幸获退休。自1931年进馆，至此凡四十年，离开第二故乡北京，返回浙江嵊县廿八都老家。所幸八十五岁之老母康强无恙，而余亦年逾花甲矣，母子团聚，倍加喜悦。

退休后，本打算在两三年内完成印刷史，故虽有北图、北师大、兰大、南大等再三邀请，均以家居奉母著书辞。惟为补充资料及访友，乃有福建之行。重回母校，寓老友叶国庆教授家。至集美谒陈嘉庚先生雄伟墓葬。访泉州唐宰相安南人姜公辅墓，古刹开元寺，见宋福州板藏经，残页不少。至福州与老同学包树棠（笠山）教授谒闽王祠，抄录碑文，城内开元寺宋代曾刻《大藏》已改为工厂。本拟往宋元明以来出版中心建阳麻沙、崇化书坊，以无游侣而止。

1973年至宁波天一阁，明范钦天一阁为国内硕果仅存之唯一最古私人藏书楼。与骆兆平、邱嗣斌同志共同挑选新接收之大批图书中善本，凡五旬，得见不少明经厂本、藩府本、金陵、建阳坊本、活字本、亦有明清抄本，随笔记录。自黄宗羲康熙十三年（1673年）破例登阁观书、继之有徐乾学、万斯同、全祖望、钱大昕、阮元、薛福成等。余位阁旁月余，适为黄氏登阁后之三百年。1978年11月又登，虽不能继美前修，也可说是平生

快事了。

1975年重至北京，每日赴北图看书凡两月。并以明刻《商子》等八种赠馆。1977年赴上海图书馆找资料，蒙顾廷龙（起潜）馆长予以借阅方便。会见老友谭季龙同志于复旦大学，备极欣慰。惜瑞安李师已于数年前逝去该校矣！1979年5月，被邀赴京审查《中国地方志联合殿珣，藏威凤等同志，开会约一月。即至文津街北图及北城柏林寺分馆看书，九月初回浙。

1981年至83年，每年往杭州浙江省图书馆西湖分馆古籍部阅览，边写边改，增了又删，删了又补，来回往复，动经多次，如明藩府本即先后改写了六七次，老牛破车，进展迟缓，一拖再拖，拖了近十年。在乡间写作，头几年缺乏物资，数月或不知肉味，欲尝一苹果桔子而不可得。而最困难的是无参考书，连人名、地名辞典，也要往县城去借。所以只有从手头所存旧笔记本，加以整理写出。所居老屋，严冬室内无火，零下二三度，成为名副其实的寒舍，冷气逼人，手生冻疮，夏日酷暑三十七、八度，汗水沾背，仍坚持写作，劳神苦思，废寝忘食。老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再三叮嘱“此书写好，不要再写别的了”。本拟在她生前出版，以博一笑，不料1983年4月7日弃养，享年九十七岁，呜呼痛哉！丧事即毕，乃又赴杭州，续完此书。

此书论述唐、五代、宋、辽、金、夏、大理、元、明、清（附太平天国）各代印刷的概况，亦略及对各国的影响，比旧作完整，故名为《中国印刷史》。书中对于每朝印刷，先总论，次雕板刻书地域，各种官私刻本，刻书书坊，刻本特色。次论各朝活字本及印本内容，为方便计、略依四部为次，而稍变通之。经部多为解释群经或发挥个人哲学，汉宋分歧，比较繁锁，今录其重要者。小学类除文字训古书外，附以启蒙读物。史部除古史、正史外，多评当代历史著作地方志、

登科录、家谱、历书。子部除古代诸子外，对各代科技书、医药书叙述较详，以求古为今用。集部详叙宋版诗文集（如《苏东坡集》宋板多至二十三种，均一一注明）略述词曲小说及总集。宗教书叙述佛道藏及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出版品。丛书，古今著作无所不包为印本书组成之重要部分，均附四部末，除汉文刻本外兼及兄弟民族及外国文字印刷，每朝末附公私藏书。

宋代出版比较自由，但也有禁令。藩府本为明代特有，虽早已有人注意，而很不全，宦官出资刻书，亦为历代所无。局刻本、私家刻丛书，为清代特点，故皆加以叙述。鸦片战争前后，西法石印，铅印输入中国、书中改正石印传入的年代，并叙述铸造华文铅字之曲折经过。明无锡华字铜字印书，徽派板画黄姓刻工，旧时论述者错误颠倒，今均为改正。

书中除论印本书外，又叙述年画、报纸、纸币、茶盐引、印契等印刷品。印张装订以后，始能阅读，故略叙各代装订之变迁。

写工、刻工、印工、装订工，是印本书之直接生产者，为旧社会所不齿。本书多方搜罗其生活事迹，兼及妇女、和尚，监生之刻字。

印刷物料尤其纸墨，直接影响书籍之质量与产量，宋代已能生产可以两面印刷的坚厚纸张，有的且能防蛀，政府纸厂工人多至千二百。又能造出漆黑发光，香彻肌骨的香墨，士大夫亦多造墨，每岁或至百斤。明代纸墨亦佳，清代则衰落，书中不惮繁加以蒐录。

余生平无他嗜，只研究中国印刷史与安南史，年近耄耋，始先成此印刷史，可谓无出息甚矣！昔顾炎武论著书之难曰“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未知此编有当于斯义否？梁启超云“做文物专史，一须专门，二不可贪多，若能以终身力量做出一种文物专史来，于史学界便有不朽

价值”，此书虽花了四五十年的心血，有无价值，有待于学术界之检验。由于笔者理论水平低，学识浅薄，书海无边，闻见狭隘疏漏谬误之处必多，拾遗纠谬，有望于读者。

余为此书已，提出两点希望，笔者过去在《印刷》杂志上曾建议，如能精选宋板中的欧阳、颜、柳、瘦金体、或元本中赵字体（楷书、行书两种）铸成铜模，使读者一开卷即赏心悦目产生美感，岂非比现行横轻直重方形印刷体，更加美化版面吗？又我国最早发明纸张与印刷，故古代抄本与印本书产量最丰富；但由于历代兵火，图书何止遭五厄十厄。浩劫期间为扫四旧，图书文物损失面之广与数量之巨，尤为亘古所无。现在唐五代印本，稀如鳞凤，宋板书最多，今海内外存者不过一千种左右，又半为残帙及复本。宋代报纸、宋、金钞币、茶盐引、早已未见。宋元雕板书之板木，明清铜、铅、锡活字，及当时排板印刷工具，亦均无实物留传。1959年，德国莱比锡书籍展览，实物只能送去清代常州木活字一盘。谓宜赶紧仿德国，设立中国印刷博物馆，附设纸墨、笔、砚等分馆，陈列自古代手工业生产，至最新机器与最新技术，使观众得到感性知识，增强爱国教育，缅怀先民的伟大创造发明，奋发图强，振兴中华，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是则区区之望也。

退休后写作期间，余与老母之生活，全仗大妹秀英之照顾。十余年来零星发表之印刷史越南史论文十余篇，亦赖其誊清或复写。两三年来抄录本书全稿约五十四万字，则由次妹全璞负责，其中很小部分由其夫韩庆及其子韩宁甥抄写。秀鈇堂弟韩琦甥经常告之报刊有关资料。又先后蒙北图参考组，复制组、上海图书馆、浙江省馆、宁波天一阁，予以借阅复制方便。顾廷龙、朱士嘉、白寿彝、胡道静、李希泌、冯宝琳、路工等先生及已故施廷镛，谢国桢先生或宠赐题签序文、或惠赠大作，钞示资料，得到不少帮助。而

神田博士数次来信，尤为关心，潘贤模先生自美国寄来清腊板《辕门钞》照片一张，美籍钱存训博士寄来复制资料并赐序文。瑞典原皇家图书馆研究东亚印刷史的艾思仁 J. S. Edgson 先生，自1974年来即蒙其寄赠大作。去年九、十月自美国数次来信，欲来华与鄙人会见，并商谈翻译拙稿成英文本。今年二月，他到杭州要求相见，惜春节前，余已由杭返嵊，未能会晤为憾，以上各位先生，对拙作的关怀与帮助，十分感激，特籍此向他们表示谢意。

1984年端午节于嵊县廿八都老家，时年七十七岁。

拙稿五十四万字，于85年5月、8月分两次交

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已见《上海新书目》新书预告。

《上海新书目》114期新书预告称：

“本书是作者半个多世纪来长期研究中国印刷史的丰硕成果……全书内容丰富，有不少罕见的资料和精辟的见解。本书的出版，学术界期待已久，可以说是一本中外瞩目的空前巨著……”。

关于铸铜模新学报上偶有试铸报导，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备会也曾在北京成立，惟未见行动，此自序与原序微有改易字句。此外作序者又有国际著名纸与印刷史专家美国钱存训博士与李希泌先生二人。

1987年7月19日张秀民又识于瞻山

(上接第6页)

(continued from page 6)

article assembles data of important and valuable materials so far rarely seen or existed only on foreign lands.

The author here gives a brilliant exposition of these foreign collections as well a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meanwhile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China is the Mecca for printing and possesses the most rich collection of books and documents in history. But there is regrettably not yet in existence any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catalogue of such early classics and printed books of China, especially because the earliest known hand-copied books, printed books and books of rubbings are all kept in foreign lands. A great number of materials good for research purpose were discovered in foreign public or private collections. Therefore it is indispensable to compile a union catalogue of old rare Chinese books kept either in or outside China.

(Page 57)

Author's Preface to "History of Printing in China"

This book is the result of half a century's hard work by the author on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ing. The book is imbued with rare data and penetrating analysis.

(Page 80)